

外国文学研究书系



易卜生诗剧研究

邹建军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易卜生诗剧研究

主 编 邹建军

副主编 杜雪琴 赵义华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诗剧研究/邹建军主编.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10

ISBN 978-7-5100-5307-8

I. ①易… II. ①邹… III. ①易卜生, H. J. (1828 ~ 1906)—诗剧—文学研究 IV. ①I533.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87 号

易卜生诗剧研究

策划编辑 张馨芳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307-8/I·0261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 序 一	王忠祥/001
◎ 序 二	邹建军/005
◎ 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	王芳实/008
◎ 从凯蒂琳的救赎之路看易卜生的爱情怀疑观	胡红梅/017
◎ 《凯蒂琳》的三个意象与易卜生的原罪意识和道德理想	周亚芬/028
◎ 《凯蒂琳》的强者价值取向	周 晋/035
◎ “选择的悲剧”	
——《凯蒂琳》艺术与主题探讨	彭姗姗/041
◎ 凯蒂琳的命运与地理空间建构	王晓燕/047
◎ 神圣的悲剧仪式	
——论《凯蒂琳》中的自然审美空间	胡红梅/052
◎ 论青年易卜生心中的理想政治家形象	
——《武士冢》中的甘达尔夫形象分析	张新花/058
◎ 论《武士冢》中海盗精神和基督教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付 瑶/066
◎ 《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	
——以“半神半人”为中心	杜雪琴/072
◎ 《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	谭咪咪/084
◎ 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	
——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	张武进 周兰美/092
◎ 《苏尔豪格的宴会》的伦理解读	周钢山/103
◎ 论《奥拉夫·里列克兰斯》中的空间性	邓 岚/112
◎ 《奥拉夫·里列克兰斯》:自我的迷失与敞亮	胡晓玲 白真真/120
◎ 《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	赵义华/127
◎ 论《海尔格伦的海盗》对民族性的建构	杨 蕾/135



- ◎ 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 刘 遥/143
- ◎ 《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安 安/151
- ◎ 英雄崇拜与英雄悲剧
 - 从伊厄棣斯看《海尔格伦的海盗》的悲剧性 陈为为/159
- ◎ 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地理空间建构和人物形象的双重性 余一力/166
- ◎ 人物与地理环境的相互映衬
 - 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 潘秋子/174
- ◎ 论《爱的喜剧》中福克的悲剧性 陈富瑞/179
- ◎ 斯凡希尔德获得爱情了吗? 张 琼/186
- ◎ 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 《爱的喜剧》中的幸福伦理观 林宛莹/193
- ◎ 《爱的喜剧》三元宗教隐喻探析 代云芳/199
- ◎ 从家族利益到国家政治
 - 试析《觊觎王位的人》的王权伦理冲突 袁运隆/211
- ◎ “无爱的悲剧”: 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 邹建军/219
- ◎ 论《布朗德》中“母亲”的双重意义 王冠含/234
- ◎ 从《布朗德》看易卜生的宗教观 王 璐/241
- ◎ 诗意的栖居: 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 高 丹/248
- ◎ 《培尔·金特》何以为诗 雷 雯/254
- ◎ 《培尔·金特》的宗教救赎之路 高 丹 邹建军/259
- ◎ 从叙事真实视角论培尔·金特的主体危机 王 娜/268
- ◎ 易卜生诗剧研究在国内 袁艺林/277
- ◎ 易卜生诗剧研究在国外 袁艺林/293
- ◎ 后记一 杜雪琴/310
- ◎ 后记二 赵义华/314

序 一

王忠祥

关于挪威诗人、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西方和东方的读者、学者已经发表了那么多的意见,以至看来好像无话可说了。但是如同歌德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1826)中所评说的那样:“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因此,对易卜生及其文艺创作的解读与研讨也是没有止境的,是说不尽的,并且会伴随时间前进的步伐日新月异。

提起“说不尽的易卜生”,令人赞叹不已!他的名字和文艺作品(特别是创作)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在“五四”以前,易卜生的戏剧就在知识界传播。“五四”以来,新的时代需求使易卜生和他的戏剧更加广泛地在中国流传。新中国建立以后,易卜生及其文艺创作的评价与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论著和评著相当丰富。我在《易卜生研究的状况与发展趋势》(“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中讲过两个世纪之交十年间我国易卜生研究的成绩和特点,此处不赘述。与此同时,我也曾经强调指出:我国易卜生研究存在着亟待充实、补上的“空白点”,如对易卜生的诗歌、诗剧的系统研究等,这是“弱项”,甚至是“缺项”。2005年6月,邹建军教授主持、王远年编选的《易卜生诗歌研究》一书问世,弥补了易卜生研究中这一“无人区”的缺憾。当下,邹建军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可以视作《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姊妹篇”。此书结合《易卜生诗歌研究》,具有先后强化易卜生研究中“弱项”的积极意义。更为主要的是,它的“主旋律”通过宏观把握与微观深研,凸显了锐意创新精神和辩证逻辑思维,其丰富内容涉及一系列当下的诗歌原理、戏剧理论、文艺批评方法以及比较文学学理探讨等,不乏启示引发作用。邹建军主编此书,从策划、研讨到撰写成书,多次与我进行学术“对话”,我有幸提前阅读了全部书稿,获益匪浅,颇有良好感悟,故乐意应约为之作序。



全书所收录论文,包罗了对易卜生 1868 年以前创作的十部剧作的精读鉴赏。为了更好地表现易卜生早期诗剧创作实质,即民族浪漫主义与时代精神的诗化剧化,以及凸显其讽喻现实、探究人性的历史性和哲理性的总主题,编排以大体的剧作写作先后为时序。《凯蒂琳》、《海尔格伦的海盗》在中国易卜生研究中论者不多见,故加强了“量”的力度。《布朗德》和《培尔·金特》的研讨,仍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聚焦于布朗德形象和培尔·金特形象的“本质新探”。构架模式以及章节标目,清晰而引人关注,不落俗套。

一般说来,易卜生诗剧大都采用散文,《培尔·金特》是集中创作早期最后一部较纯的诗剧。《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写成于 1854 年,大体上是散文式的五幕悲剧,取材于英雄传奇和歌曲,剧中不乏吟咏歌词和充满韵味的话语,与同时期诗剧艺术风格近似,编者将此剧评论纳入论文集中,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关于这本论著的学术前沿特性和伦理建设价值,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予以解说。

首先,学术视野弘阔,评论务实求新。就全书总主题(易卜生诗剧研究)统领下的各组系列论文内质外化而言,作者以多维视野中的古今中外文学论为经,以剧作家、诗人易卜生的诗剧意识和艺术发展轨迹为纬,密切关注经纬交织并链接其创作全程,探索作品中深藏不露的多重代码,进行当代意识的多元化诠释。何以见得,可以举隅验证。无论是关于《凯蒂琳》一组论文中的《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王芳实)、关于《海尔格伦的海盗》一组论文中的《〈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赵义华),还是关于《布朗德》与《培尔·金特》一组论文中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邹建军),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比较而言,作为首选实例者应是邹建军评布朗德形象之“一种内质”一文。此文在充分探索并关注布朗德形象评论史迹的基础上,发表承传精华而超越创新的意见,重在“现代阐释”。邹文并不否认中外学者所公认的“易卜生式的自我主义”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批评价值,但反思其宣扬布朗德“全有全无人格”的“无爱的悲剧”。邹文运用伦理学批评方法,并结合宗教哲学、悲剧文学理论等纵横交错,而深入论证了“以布朗德为中心”的三个问题:无爱的家庭伦理关系、无爱的社会伦理关系、无爱的宗教伦理关系。依论文的作者之见,易卜生的“自我”表现者布朗德的“自我主义”走向极端必然是排斥他者的,其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因此“《布朗德》是一出无爱的悲剧”。这里关于布朗德形象本质的诘难,与前人有关评论不同,确有超前的新意(当然还有研讨空间)。此文已明确提出:布朗德形象的塑造及创作

的“主体精神”，都是在“四种地理空间的建构里得到实现的”。我们可以期待作者在易卜生人物新探的高速道路上更上一层楼，在弘阔的文化视野中充分发挥理论雄辩（纵横捭阖）的优势，并刻意求新。《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显得特别突出。比如，议论凯蒂琳死于“谁手”时，王芳实指出：只有把凯蒂琳和弗瑞亚看成是个“结合体”，才能知道杀死凯蒂琳“是弗瑞亚与凯蒂琳共同完成的”。王文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阐明研讨《凯蒂琳》应联系其整个戏剧体系的道理，十分精当。深思凯蒂琳形象的意向与作为，不难测量剧作家寄寓其中的“自审精神”（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往后出现的布朗德形象、培尔·金特形象，乃至后期剧作的主要人物形象中，如此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中虽有发展与变异，却始终存在，甚至可以当做易卜生主义的精髓。赵义华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融合在一起，从新视角（信息论等）探讨《海尔格伦的海盗》剧作中复杂的信息交流问题。赵文别开生面地推出颇有见地的论断：不仅《海尔格伦的海盗》，而且名剧《玩偶之家》，都是“交流阻滞型悲剧”。此论不俗，发人深思。

其次，问题意识浓烈，文本分析精深翔实。连续上文话题，在弘阔的学术视野下，中西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才能日新月异。与此自然链接，易卜生诗剧创作蕴含着多重代码，务必充分发扬质疑意识和精思的功效，才能正确解读并破译文本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代码，提出学术前沿命题，进行求新同步互动的精深阐释。本书关于易卜生的诗剧研究，包括理论、方法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之调动，反映了编著者的“问题化”（problemathation）意识和“再思考”（rethink）的强劲能力。编著者汲取前人论著精华时，善于从梳理和质疑（乃至批评和辩驳）中提出不同而引人关注的见解。除开前文涉及的剧作理论，还可列举几篇佳作略予简说。

杜雪琴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追问《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中“半神半人”意象的三重隐喻，即爱情的困惑、宗教的批判、政治的反讽，并围绕中心意象形成“多层性的潜隐的环状体”。此文经过精思而连续追问并予以论证，认为易卜生从此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一直到创作后期“都在执着于寻找象征”，此言可信，持之有据。周亚芬探索与评析《凯蒂琳》的三个意象和剧作家道德理想的象征连锁关系。谭咪咪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运用心理学原理追究英格夫人丧失国土、错杀亲子“双重悲剧”的心理根源。陈富瑞敏感地觉察《爱的喜剧》里深刻的悲剧精神，紧扣文本实际拷问福克的悲剧精神所折射出的“易卜生社会之路的探索”。诸如此类的篇什，均有



激发人们“再思考”剧作中主要人物形象本质的欲求。

在这本论文集中,由于强劲“问题意识”的催化,邓岚的《论〈奥拉夫·里列克兰斯〉中的空间性》、王安的《〈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以及雷雯的《〈培尔·金特〉何以为诗?》,从评析理论到研究方法均能不拘一格。邓文通过文本细读,剖析了剧中显现的三重地理“空间性”以及剧作家的“空间审美理想”。安文从生态女性主义新视阈考评了剧中伊厄棣斯等三个主要人物关系所潜隐的象征意义,从而导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依存”的主旨。雷文翔实论证了《培尔·金特》作为一首诗的特征和性质,并确认它以诗的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易卜生主义”,同时强调指出剧作家对主人公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予以否定。这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乏真知灼见。事实如此,早在诗剧创作之初期,易卜生主义(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已初露端倪,往后日益强烈、复杂、深化。其中,“自审精神”包括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贯穿于剧作家创作的全过程。

毋庸置疑,易卜生的诗剧也是说不尽的。本书问世是良好的开端,有些重大学术前沿问题理所当然有待进一步探赜钩深和精细地研讨辨识。这就是我作为书稿第一位读者的深切感受。刍荛之议,仅供参考。我认为这部系列论文集的出版定会引起学界有益的思考和评论,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难道并非如此?

是为序。

2009年6月8日

序 二

邹建军

易卜生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世界戏剧史上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爱好文学的读者,如果不知道易卜生及其作品,会被认为是很大的笑话;研究艺术的学者,如果不研究易卜生的戏剧,会被认为是没有眼光。然而,许多中国读者与研究者往往只知道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而不知道其早期的诗剧与后期的象征剧,对于他那十分杰出的诗歌作品,几乎就更没有人提起了。其实,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甚至他终其一生的诗歌写作,也并不比中期社会问题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差到哪里去。《在高原》和《泰尔耶·维根》这两首长诗,其内涵之深广、体式之独到、艺术之讲究,并不在《玩偶之家》与《人民公敌》之下。在早期的十部诗剧里,虽然也有试笔之作,然而像《布朗德》、《培尔·金特》、《海尔格伦的海盗》、《苏尔豪格的宴会》、《武士冢》这样的作品,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与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的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一些学者随顺流俗,只研究“五四”早期中国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社会问题剧,并且总集中在那样两三部作品身上,大写特写其关于易卜生的学术论文,整体来看,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谨的。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

易卜生诗剧与其中期社会问题剧、后期象征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并非本人的主观臆测。早期诗剧《爱的喜剧》与中期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探讨的都是两性之爱,早期诗剧《布朗德》与后期象征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



候》都探讨了“在高处”的哲学，早期诗剧《培尔·金特》与后期象征剧《建筑师》都重点讨论了人性的善恶，早期诗剧《海尔格伦的海盗》与后期象征剧《海上夫人》都探索了人性神秘性的问题，如此等等。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整体，早期、中期与后期的作品之间不仅没有天然界线，并且从来没有真正地分离过。易卜生在三个时期里所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他不断追求与不断上升的过程，让其戏剧作品更加丰富与深厚；然而，所有的戏剧作品都是易卜生本人所创作的，在许多方面前后相关、左右相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其中期与后期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其早期作品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其思想情感的发展轨迹，了解其戏剧艺术上的不断探索。易卜生作品里存在的这种“互文性”，并不说明他总是沿袭或者重复自己，相反，恰好说明了他的成功是有雄厚基础的，具体体现了自我实现与自我探求的心路历程。

华中师范大学易卜生研究团队，最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在易卜生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易卜生诗歌研究。2006年，我主持并由王远年编选出版的《易卜生诗歌研究》，经聂珍钊教授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带到挪威，作为世界上第一本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集，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此之后，继续研究易卜生诗歌作品，又有多位学者发表十多篇论文，体现了对易卜生诗歌的不断探索。本人也曾经发表过四篇论文，有的还为《新华文摘》所转载。二是易卜生诗剧研究。自2006年开始，我主持一个易卜生诗剧研究的项目，由硕士研究生赵义华具体负责实施，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初步编成一个由二十四篇论文构成的论文集；后来，由于赵义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就拖了下来。2011年，由博士研究生杜雪琴接替，按照易卜生早期诗剧的写作年代进行编排，再次增补了新写的十二篇论文，形成了一个涵盖三十六篇论文的论文集。三是易卜生后期象征剧研究。最近几年，最少有五位研究生选择了易卜生后期象征剧作为硕士与博士论文选题，研究了《海上夫人》、《建筑师》、《野鸭》、《罗斯莫庄》以及其他后期剧本，有的论文在重要刊物得到发表，引起学界关注。我所在的易卜生研究团队，在王忠祥、聂珍钊等前辈学者的指导下，最近十年有计划、分步骤地从事易卜生作品研究工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其意义是不可小视的。相信我们的团队成员会持续不断地关注易卜生作品，为中国“易卜生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看来，我手头这部易卜生诗剧研究论文集，为文学经典的重读树立了典范。关于赵义华阶段的《易卜生诗剧研究》，王忠祥教授在“序一”中已

经做出了可靠评析,不再多言。本书对易卜生诗剧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三个优势:一是文本细读;二是理论视角;三是问题发现。首先,论文集里所有论文都是在细读易卜生戏剧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每一篇论文基本只是分析一部作品,重点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因此不存在没有阅读文本而写作论文的情况。有了阅读的体验与审美的过程,才有了写作的欲望与冲动。代云芳关于《爱的喜剧》三元宗教隐喻的讨论,就是在文本细读前提下提出来的。其次,作者们往往都有自己的理论视角,由于本学科学者近年来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以此两种批评方法切入易卜生戏剧文本的论文,不在少数,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周晋、林宛莹、袁运隆的论文从伦理角度探讨作品里的伦理主题与伦理悲剧,邓岚、余一力、潘秋子的论文从地理空间角度探讨人物形象与主题中的地理要素及其产生的意义,都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再次,杜雪琴、陈富瑞与袁艺林的论文,从对历史文献与作品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重要问题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论述。杜文集中探讨了“半神半人”的三种隐喻意义,陈文集中探讨了福克的悲剧及其根源,袁文对国外与国内易卜生诗剧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综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所进行的论证,在中国易卜生研究的历史上,皆属首次,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易卜生诗剧研究》历时六年,两位副主编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杜雪琴为了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果没有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王忠祥教授以八十高龄为本书写序,体现了一位前辈学者对后学的奖掖与支持,在此祝他生活美满、健康长寿!

2012年4月30日

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

王芳实

内容提要:《凯蒂琳》是一部命运悲剧。灶神尼弗瑞亚作为凯蒂琳的异己存在,不仅催生了凯蒂琳命运的突变,还以她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使悲剧命运得以演绎和完成。一是作为凯蒂琳的内心影像,弗瑞亚突出了凯蒂琳英勇无畏的主导性格;二是作为凯蒂琳的复仇女神,弗瑞亚在为妹妹报仇,并促使凯蒂琳以死来完成赎罪的命运;三是作为爱恋凯蒂琳的女人,弗瑞亚盼望凯蒂琳能尽早开始与自己在墓穴中的团聚,她对凯蒂琳的感情也成了完成他的命运的一个原因。她与凯蒂琳的关系突出了这样的主题,即悲剧英雄正是以不屈服命运的行为来完成他们命运的。

关键词:弗瑞亚 凯蒂琳 命运 复仇 爱情

作者简介:王芳实,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20世纪西方文论。

《凯蒂琳》是易卜生的第一个剧本,为三幕无韵体诗剧,取材于古罗马史学家萨莫斯特(或译撒路斯提)的《凯蒂琳传记》和西塞罗关于凯蒂琳的演说稿。剧作家笔下作为英雄的凯蒂琳与历史记载的作为叛逆的凯蒂琳不同,作家“同情凯蒂琳向旧世界宣战,并为正统派心目中的这一‘叛徒’的际遇鸣不平”^①。现在来看,“鸣不平”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古罗马的传记和演说稿并不是历史本身,它们只是流传下来的关于历史的文本,而诗剧要为剧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中的历史服务,它已完全——只涉及历史——是另外一个文本了。易卜生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确定一部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时,其中是否存在历史因素的问题当然不具有任何意义”(“克里斯替阿尼遏剧

① 王忠祥:《凯蒂琳》题解,《易卜生文集》第一卷,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

院舞台上的《威廉·拉塞尔勋爵》”，《易卜生文集》第八卷，189）。我们谈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这出剧很容易让人陷入历史背景中，把它当做表现政治的戏剧来看。其实它是一出命运悲剧，一如剧作家所说：“我后来的作品一直引以为中心的能力与愿望之间的矛盾，意志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似乎都已在这里隐约地有所表露。”（《凯蒂琳》第二版作者序，《易卜生文集》第一卷，9）意志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在古希腊命运悲剧中常常表现为意志与不可知的命运的斗争，而在这里，它却表现为意志与异己力量的冲突。

在剧中，凯蒂琳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围绕在他周围的大多是追求个人权力和享乐的无耻之徒，或是另有阴谋的野心家；但上述因素并不是造成他失败的直接原因。毁灭性打击来自灶神尼弗瑞亚的阴谋（告密），而凯蒂琳所受的致命一击也来自弗瑞亚刺出的匕首。除凯蒂琳固有的反抗性格之外，挑起他斗争欲望甚至引导他去战斗的也是女尼弗瑞亚，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弗瑞亚就是凯蒂琳的命运骤起波澜的原因。于是，整个诗剧所展现的主要矛盾就不是凯蒂琳对罗马权贵的反抗，而是他与女尼弗瑞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因此，关于凯蒂琳的命运，就有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即弗瑞亚在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作为凯蒂琳的内心影像，作为复仇女神和恋爱中的女人，弗瑞亚决定了凯蒂琳的命运，并把完成这一命运当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她对凯蒂琳是又爱又恨，但对于凯蒂琳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来说，她终归是以异己的力量出现，在以邪恶的方式重塑凯蒂琳的崇高。她在诗剧中的意义在于，她以她的方式书写了这样一个关于命运悲剧中英雄的传说，即英雄正是以不屈服命运的行为来完成他们的命运。

一、作为凯蒂琳内心影像的弗瑞亚

凯蒂琳用意志在与命运抗衡，但他的意志却又是从异己力量弗瑞亚身上体现出来的。

“弗瑞亚 你说——追逐你？不，我是你的影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无法丢开我。”（55）^①“弗瑞亚 我只不过是由你的心灵/反映出的一个形象……凯蒂琳（狂热地）啊，可爱的复仇女神——/你是我的影子——我的心灵的真实化身——/这里是我的手，我向你作出万事不变的保证。”（61）诗剧并不刻意地去模糊这样一层关系，即弗瑞亚也是作为凯蒂琳的心灵影像

① 本文所引易卜生诗剧《凯蒂琳》均来自《易卜生文集》第一卷，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而存在的，像上述直接提到弗瑞亚是凯蒂琳的影子的诗句，诗剧中至少还有两处。

从剧情上看，弗瑞亚是一个复仇女神。她知道凯蒂琳是害死自己妹妹的仇人，并知道他又一次在亵渎神灵中使自己深陷墓穴之后，随即开始了巧妙地借用各种人物关系来安排的复仇计划，她鼓动凯蒂琳行动，又借库瑞亚斯对自己的爱恋唆使他去告密，一切的一切，都是要置凯蒂琳于死地。但从她的出现与凯蒂琳的行为的关系来看，她其实是促使凯蒂琳不断保持高昂斗志的原因。她作为凯蒂琳的心灵影像的一个侧面，突出了凯蒂琳胸怀大志、英勇无畏的主导性格。诗剧以凯蒂琳坦露自己痛苦的内心冲突来开场，他说“我有勇气，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求/远比目前更为高尚百倍的生活——”，但“只要严酷的现实发出一点声响，/它们（勇气和力量）便立即向心灵的幽深处隐藏”（13）。他无法解开的结，到第二幕就几乎被他的妻子解开了，妻子让他远离斗争的中心，到贫瘠的高卢去过贫穷但自由的日子。既然失去了战斗的勇气，也该离开“一串无节制的放荡——”生活，他已下定了决心离开充满欺骗和阴谋的罗马。放弃斗争等于放弃尊严，这当然不是凯蒂琳的命运，于是作为内心冲突中强有力的一面，弗瑞亚在最危急的时候以主人公内心的影像出现了。

弗瑞亚鼓励凯蒂琳不要放弃反抗，要勇往直前，并不断提醒他认识自身所具有的英雄气概。我们来听听弗瑞亚与凯蒂琳的对话：

凯蒂琳 我只能如此！这是无情的命运作出的决定！

弗瑞亚 你的命运？那你为什么天生具有英雄气概——
难道那不是为了让你去和你所谓的命运抗衡？

.....

凯蒂琳 我并非无缘无故感到恐惧。
我发现我所追求的目标实际是高不可攀——
那一切全不过是转眼即逝的年轻人的梦幻。

弗瑞亚 那你是完全看错了你自己，我的凯蒂琳！
关于那个独特的计划，你还在那里犹豫；
你具有崇高的心灵——做一个统治者，当之无愧——
你有许多朋友——。啊，你却为什么犹豫？（57—58）

这样的对话完全可以看出是凯蒂琳的自我追问，如果把人物隐去，它就是戏剧艺术中的内心独白。正是由于弗瑞亚的出现，在反抗的斗士群龙无首的时候，最具英雄气概的凯蒂琳肩负起了领导的责任；当贪婪和私利模糊

了斗争方向的时候,他用正义、自由和国家的荣誉为他们的行为赋予了意义;在计划泄露、整个行动必败无疑的时候,他毅然拿起武器选择了死亡。他要为之而战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瞧——我要全力增进人民的自由——/过去这种民主精神原本完全统治着/罗马城。朋友们,我决心要重新召回/那黄金时代,那时候,所有的罗马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保卫国家的荣誉而欣然献出生命,/那时候,一切财富都是公共福利的根本!”(70)在剧中,凯蒂琳有过徘徊、犹豫,但每一次当他产生迷惘并准备放弃的时候,都是弗瑞亚以凯蒂琳内心影像的方式出现,让他在自己的如镜子般的影像中找回了自己,重塑了自己。我们知道,就弗瑞亚而言,她是在安排她的复仇计划,挑唆凯蒂琳行动并希望他能按计划在行动中走向毁灭;但作为凯蒂琳的反抗命运的命运,最终成为他的主导性格的无所畏惧,却仍以独立的舞台形象表现了出来。弗瑞亚作为凯蒂琳内心影像的存在,起码具有如下两点意义:

第一,它展现了欧洲文学的传统,体现了“作恶造善之力之一体”(《浮士德》语)的辩证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讲,弗瑞亚之于凯蒂琳,就等于魔鬼靡非斯特之于浮士德。她以恶为目的的煽动,表现的却是英雄豪杰不屈的奋斗精神。弗瑞亚在设计暗害凯蒂琳,但凯蒂琳按她设计的道路每走一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上高扬起他不屈的头颅。也就是说,没有弗瑞亚的作恶,就不会有凯蒂琳高尚的一切。我们之所以说弗瑞亚也是凯蒂琳内心的影像的一个侧面,是因为弗瑞亚并没有像靡非斯特那样,直接从作恶的角度去完成浮士德的造善工作,而是幻化为凯蒂琳内心冲突的一面,真实地表达了凯蒂琳自己无法束缚的精神状态。

第二,用弗瑞亚来展示凯蒂琳的内心,使内在精神在戏剧表现艺术中找到了多个外化点。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而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从美狄亚杀死亲子来对伊阿宋进行报复时的悲恸,到麦克白面对巫婆的蛊惑时所产生的震撼,再到熙德于决斗中直面情人的父亲时的无助,无不表现了内心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绝大多数戏剧在突出主人公的内心冲突时,都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方法——如丹麦王子关于生存和毁灭的思考,而时年只有二十一岁的易卜生却在这出戏中为我们提供了可感的心灵具像。

二、作为凯蒂琳的复仇女神的弗瑞亚

弗瑞亚要为妹妹复仇,她在苦苦追寻逼死她妹妹的凶手,结果出乎意料,凶手正是她爱着的凯蒂琳。也正是他们相互表达爱意并追寻复仇对象



的过程,使复仇行为获得了新的意义,即复仇包含了赎罪的内容。凯蒂琳不仅逼死了弗瑞亚的妹妹,还又一次冒犯神灵,使弗瑞亚被打入黑暗的墓穴之中。

凯蒂琳的命运是不向命运屈服,而他为之屈服的命运也包括赎罪。他犯的罪是冒犯了神灵,他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渎神行为有两次:第一次是他在年轻时奸污了身为灶神女尼的弗瑞亚的妹妹西尔维娅,并使她在屈辱中投河自尽;第二次即他与同样身为灶神女尼的弗瑞亚的爱情。什么是灶神?“或为家室女神。传说古罗马的第二个王努马·彭皮利乌斯为司炉灶的女神维斯塔(Vesta)建立了第一座庙宇,供奉维斯塔的女尼必须保持童贞,必须维持神殿上永不熄灭的火,如有人破坏这一规定,人们就将她活埋。”凯蒂琳应该知道灶神代表了异质于人类的神圣精神,但他仍然冒犯神灵,用人类的阴暗心理和卑劣行径去面对体现灶神意志的圣洁女尼。在到灶神殿去见弗瑞亚时,他面对库瑞亚斯的劝告,说出了整个诗剧中——就他而言——最为轻佻的语言:“哈,我喜欢换换口味。过去我还/从不知道一个修女的爱——这禁果——是如何味道;/因而我来到这里,要试试看我的运气如何。”(23)这一次的冒犯与前次不同,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女尼自身也动了凡心,弗瑞亚也爱上了具有英武之气的凯蒂琳。祭祀条规对于保持童贞而言,当然更看重保持者的操守心理,因为精神的背叛是本质的不洁,于是就冒犯而言,凯蒂琳与弗瑞亚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尽管弗瑞亚在心里一直把供奉灶神看成是痛苦的差事——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而她出于对神灵的畏惧和对自己确实犯戒的认识,也坦然接受了被惩罚的命运,所以她疯狂的言行在坟墓里逐渐平静了下来[“但在这坟墓里边却是如此安宁——如此平静”(42)];所以她逃出墓穴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又要赶紧回到她的葬身之地[“黎明一来到,我便匆匆赶回,/仍回到我来自的黑暗的幽谷去”(79)]。诗剧这样展示了圣火的熄灭:“他(凯蒂琳)冲了出去;燃着圣火的灯立即熄灭掉。”(30)但是现在,两次亵渎神灵并作为主要行为者的凯蒂琳,却并没有与她一道遭受戒规的惩处。这就是弗瑞亚在坟墓中虽逐渐平静但始终不能安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凯蒂琳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赎罪命运,他在发誓要帮助弗瑞亚复仇之后发现自己就是复仇的对象。本来,“与自己为敌”也可以作为最具震撼的生命力来展现,一如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但是,为理想而战的事业已经开始,反对罗马权贵的斗争把他推向了前台,他无暇去顾及高高在上的神灵。所以接下来,弗瑞亚作为阴谋的策划者,借这场暴乱来完成了她的复仇,完成了她与凯蒂琳共同的赎罪命运。正因为如此,弗瑞亚才不断向凯蒂琳强调他们命运的同质特点: